

红军“铁的纪律”是怎样淬炼的

■钟燕林

军史回眸



1930年，中央军委参照苏联相关法规条令制定了《红军纪律条例草案》。草案共分4章，分别为总则、奖励、惩戒、附则，说明了纪律条例颁布的必要性及奖惩细则。图为其中的部分内容。

资料图片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红军铁的纪律不仅是军事胜利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严明纪律的形成和淬炼，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期革命实践的宝贵精神财富。

加强军队组织纪律

健全的架构、严明的组织纪律，是打造“铁的红军”的关键所在。红军的纪律与旧军队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的纪律截然不同，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遵守，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929年12月，红4军前委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提出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加强红军中工人骨干和党的骨干，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通过的《扩大红军问题的决议案》则明确指出：动员苏区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会会员，以及他们的干部到红军中去，对于加强红军中政治机关与党的组织是十分必要的。

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在无产阶级团结的基础上，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促使大家自觉遵守纪律。红军政治教育，不仅是对政治中的一些问题进行鼓动与解说，还进行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自觉地坚决地为苏维埃新中国斗争到底，使红军部队成为苏维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红军的政治教育效果显著，红军指战员起到了带头作用，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

重视军队群众纪律

群众纪律直接关系到军队在群众中的形象。不侵犯群众利益，成为红军部队必须遵守的规矩。

红军初创时期，就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是针对群众利益颁布的军队纪律。“瑞金大柏地借粮还款”就是遵守群众纪律的鲜活例子。1929年农历除夕，红4军来到大柏地宿营。大柏地村中的老百姓对红军不了解，很多都逃走了。此时，红军官兵又饥又寒，经费也不够。他们只好借用当地老百姓的粮食，留下借条。几个月后，红军重返大柏地，偿还银钱给老百姓，赢得百姓称赞。

1929年4月5日，红4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提到红军“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任务。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得到了群众的积极

拥护。

为进一步严明军纪，1930年3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南康县唐江镇发布红4军军部第三号训令，即《整顿军风纪的训令》。训令指出：“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奢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红军还安排巡查组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就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整改。

狠抓军队廉洁纪律

红军的廉洁纪律也是其严明纪律的重要内容。红军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都强调廉洁自律，反对贪污腐败，对于保持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32年1月2日，朱德与王稼祥、彭德怀联名签发的《中革军委转发临时中央政府对整个财政的规定的训令》中规定：“除分令各军团、各军、各独立师，转飭所属财政机关遵照执行外，合行仰该〔首〕长飭所属各级财政机关，遵照此训令及中央政府颁布之暂行财政条例，并新印发之各种簿记等严格执行为要”。1932年2月，中革军委发布《经理工作问题提案》和《经理公开条例》，条例分为账目的审查、账目公布及账簿、单据保管3个部分内容。针对军委所属各机关、学校、医院及红军中之经理（财政）工作，尚未建立正确统一独立的工作系统问题，进一步明确各项规定，要求各级部队及经理机关切实遵照实行。

红军的财政纪律十分严格。比如，“打土豪要归公”，所筹之款，必须上缴，不得私自挪用和侵吞。各连或团所捉之土豪，所没收之款项，应一律详报与解缴师政治部，而师政治部应按照各种表册每旬或每一次筹款工作结束时，汇报军团政治部与总政治部。打土豪必须经过团政治处或政治部的核准，各连不能自由没收土豪财物。没收以后的分配或发给群众也应由团政治处或直属上级政治机关负责处理，各连不能自便处理。

感悟伟大长征中凝结的军政军民团结光荣传统——

一曲英雄壮歌 一脉鱼水深情

■张世贵 何 焱

湖南汝城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中。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连一床完整的被子都没有。临走时，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留给了徐解秀。后来，老人含泪说：“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红军的爱民之心，同样温暖着少数民族地区的同胞。1935年8月，红25军抵达静宁县城以北的单家集、兴隆镇等地。兴隆镇一带是回民聚居的地区。军政委吴焕先主持制定并颁布“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族的经典文字，禁止在回族地区吃大荤；注意遵守回族的民风习俗，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平交易。

红军到达单家集后，吴焕先召集当地的知名人士和阿訇开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并讲明红军只是稍作停留，不征粮派款、不拉伙抓丁，以解除回族群众的思想顾虑，稳定人心。红25军在这里只待了短短3天，但与老百姓结下深厚感情，多名回族青年还主动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在部队离开时，当地群众设置香案茶桌，摆上点心油果，为红军送行。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途经单家集，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后来，毛泽东提起红25军在经过回民区时留下的好影响，称赞红25军民族政策水平很高，执行得很好。

长征是红军的远征，也是人民群众保护红军、支援红军、参加红军的伟大史诗。1934年12月，红9军团途经贵州

省锦屏县，官兵主动帮老百姓挑水砍柴、修理房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军的优良作风深深打动了侗族青年杨和钧。他在自家的账本上写下诗歌，深情赞美红军，抒发革命追求。红军撤离后，他冒死收留受伤掉队的两名红军伤病员，悉心照料、掩护他们转移。后来，他准备北上寻找红军，写下一首诗《再见》：“再见连绵的山峦，再见淙淙的小溪，再见穷苦的农民兄弟，再见父母妻子儿女，再见吧，再见吧，家乡的一切！我要北上，寻觅那光辉灿烂的红日。”但他外出寻找红军未果，后来不幸被捕，英勇就义。长征途中，这样舍身相助、以命相护的动人故事还有很多。

红军远离根据地，转战数万里，沿途各族群众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物资支援。红军过雪山前，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辣椒、皮袄；过草地时，藏族同胞送来青稞、牦牛，教红军识别野菜、辨别方向。在云南、四川、甘肃等地，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没有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援，红军恐难翻越雪山、走出草地。

各族群众还踊跃送亲人参军。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长征路。于都银坑镇窑前村妇女钟招子，毅然将8个儿子全部送去当红军，临别时含泪叮嘱：“一定要打胜仗，娘等你们回来。”儿子们走后，钟招子每天晚上都会在门前点起一盏马灯。她说：“这样，儿子们回家时就能看清路了。”

万千群众怀着“跟着红军走，穷人才有活路”的朴素信念参加红军。四川通江、南江、巴中等地，涌现出多个“红军村”和“扩红模范区”，父送子、妻送夫、



兄弟争相参军的场景感人至深。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军民合力，无往不胜。红军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群众主动帮红军传递情报、封锁消息、迷惑敌军，为红军保驾护航。赤水河畔，沿岸群众捐出家中的门板与船只，帮助红军搭建渡河浮桥，全力帮助红军渡河。金沙江皎平渡，当地船工挺身而出，昼夜轮番摆渡，护送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圈。大凉山深处，彝族同胞深明大义，引路护送，帮助红军顺利穿越彝区天险……

军政军民团结优良传统历久弥新。从长征路到新时代新征程，军民团结一心始终赓续传承。

上图：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这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见证着红军家属钟招子送8个儿子参加长征后，对他们的思念和牵挂。

资料图片

本版学术支持：褚 银

亲历者讲述

本期“亲历者讲述”，撷取两位老兵的口述故事。一只土陶罐，立起老兵心中永不磨灭的纪律丰碑；一件红棉袄，留下军民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两段军旅记忆，生动映照我军纪律严明、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让我们一起从这些质朴动人的故事里，汲取精神力量，传承优良作风。

——编者

我16岁走上长征路，经历过三过草地的艰险，经历过失去父兄的悲痛，也经历过圆满完成任务的喜悦，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在快走完长征时，我被党组织列为发展对象。对此，我欣喜万分。

1936年10月，部队到达甘肃会宁。刚一宿营，我就去帮炊事班做饭。因为没水，我就从一个老乡家借了一只土陶罐，去井里取水。当时，天气很冷，井水冰凉。每次取完水，我都会把盛满水的陶罐紧紧抱在胸前，小心翼翼地朝伙房走去。每次打完水后，我的手指就冻得像红萝卜。那天，我抱着装满水的陶罐快回到炊事班时，突然脚下打滑，跌倒在地，把陶罐摔碎了，我一时不知所措。

随后，我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连长。连长听了以后，眉头紧锁，表情严肃起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里百姓的日子很苦，不要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我们的部队刚到这里，就发生损坏群众东西的现象，会直接影响我军声誉的。”我没敢申辩，只是低着头，泪水在眼里直打转。

那时，战士没有津贴费，拿不出钱来赔偿。翌日清晨，连长和指导员亲自到那户农家赔礼道歉。因为这件事，组织上宣布给我一个处分。听到这个决定，我心里难受极了，本该快入党了，可眼下……

我一连几天情绪低落，不时地责备自己。指导员看穿了我的想法，找我谈心：“小马，今后的革命道路还很长，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几位老党员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也向我伸出温暖的手。他们一次次找我谈心，让我对党的群众纪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一年多后，由于作战勇敢、表现积极，我正式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

1962年的秋天，我出差到北京，有机会参观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走进“人民群众支援前线”展览区域时，我的目光被一件红棉袄吸引住了。这不就是15年前我穿过的那件棉袄吗？上面解说词写着：“此棉袄，是老解放区山东莱阳县小李村王秀兰同志的。她用这件棉袄，为两名革命战士御过寒，挽救过战士的生命……”看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

那是1947年冬，国民党军进攻胶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第9纵26师在即墨打了一次阻击战。战斗结束后，我们第77团来到莱阳城西北方向的小李村作短期休整。我当时在团卫生队工作，就住在王秀兰大婶家。

当时环境艰苦，卫生条件差，疥疮的发病率很高。我们买不到凡士林或猪油，就用花生油配制“疥药膏”为官兵治病。一天，我取药膏时，不慎将药盆弄翻，药膏浇到了棉袄前襟。正当我不知所措时，秀兰大婶和她13岁的女儿秀子听到响声走了进来。大婶一面安慰我，一面找旧布擦我衣服上的药膏，但怎么也擦不干净。她们在外间一阵嘀咕，不一会儿，秀子拿来一个蓝包袱，外面还沾着些碎草末。她把包袱放在炕上打开，里面是一件红棉袄。这时，秀兰大婶走进来，拿起红棉袄对我说：“快把脏棉袄脱下来，换上这件红棉袄吧！这还是我出嫁时穿的，怕国民党来抢去，我把它藏在厢房草堆里了。”

娘俩催我把红棉袄穿上，随后都去了灶间。我脱下棉衣，拿起红棉袄端详起来：棉袄是斜襟的，衣襟和领子都镶着黄边。我无可奈何地把它穿在身上，低头打量着，“扑哧”笑出声来，心想，男子汉穿件红棉袄，像什么样子。我翻翻过来穿，可是里面竟然也是红色的。我只好把它放在一边。秀兰大婶进屋见我还没有换上，一下子明白了，着急地说：“十层单不如一层棉，你这样会着凉的。晚上又不出去，穿红的怕什么？暖和就行呗。”

秀子见我扭扭捏捏，像个大不一样给我上起了“政治课”：“红的有啥不好？好事就是用红色代表。革命红旗、红色政权、红色根据地、工农红军……你穿红棉袄，就成了‘红军’了！”她嘴像爆豆似的，这么一说，大婶和我都笑了。

这时，一阵急促、嘹亮的集合号声响彻夜空，原来是部队要进行行军前的检查。我把红棉袄贴身穿在里面，把单军衣罩在外面，就赶去集合了。虽然寒风刮过，可我从身上到心里，都是暖融融的。

全队检查完毕，我回到秀兰大婶

一只土陶罐

■马志选

党员。站在鲜艳的党旗下，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许多年后，我对这件事仍然难以忘怀。因为我深深感到，我党我军能在那种艰苦环境下不断成长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严格的群众纪律，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从而得到了群众的支持。那只土陶罐，是对我进行维护群众利益教育的最好一课。

（马志选，原总后勤部太原基地兵站副站长，1938年5月入党。）

一件红棉袄

■张植枫

家。秀子正在炉旁翻来覆去烤我的棉衣，又听见东侧房间传来“喵喵”的声音，大婶正在弹我那件棉衣的棉花。她见我走进来，说：“你大叔给部队抬担架去了，他要在家就好了，他弹得更好。”

我回头看到秀子身上的棉衣只剩下两层单，便明白，她身上的棉花都加到我那件黄棉衣里了。我转过身，把眼泪擦了擦。大婶安慰道：“你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打仗，可不比我们在家。我与秀子商量，把她新棉袄的棉花扒出来，先给你絮上。你走后，让她穿那件红棉袄。等以后日子好过了，我再给她做件红缎子的。”

第二天，集合号声响起，我起床后看见被子上盖了一件又干净又松软的黄棉衣。临走时，我把那件红棉袄方正正叠好放在炕头上，向它敬了一个军礼，并向秀兰大婶和秀子依依不舍地告别。

行军路上，卫生队副队长见我的棉衣一夜间变了样，感到纳闷，走过来问我，我便向他叙述了经过。他不住地点头说：“老解放区的人民，向来把我们当亲人。在这个村，只几天时间，类似的事仅我知道的就不下十几桩。总有一天，喝墨水多的人会把它写成书，拍成电影，留给后人，代代相传。”这时，不知谁领头，唱起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军队和老百姓，嗨哟，咱们是一家人……”

（张植枫，原解放军第358医院放射理疗科主任，1947年10月入党。）

（以上两篇口述文章摘自《红色血脉》（解放军出版社）第一卷——“深情颂伟业、永远跟党走”主题征文作品集）